

包法利夫人

譯文叢書

福樓拜全集

李健吾譯

包法利夫人

——外省風俗

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

## 譯者序

聖佩甫批評包法利夫人，最後點出時代和牠的巧合：

『作品處處蓋着牠出現的時間的戳記。據說，寫了好幾年，恰好在這辰光趕到。介乎泰尼 Taine 兩篇論文之間，聽完一齣小仲馬的喜劇的尖銳乾脆的對話，或者給假好人喝完采，正好來讀這本書。因為在許多地方，形式儘管不同，我相信看出一些新的文學的符誌：科學，觀察的精神，成熟力，一點點嚴酷。這似乎正是感染新一代的領袖的特徵。著名的醫生的子弟，居斯達夫·福樓拜先生捉筆就和別人操刀一樣。解剖家與生理家，我處處又找到你們！』

同樣是布呂地耶 Brunetiere，在福樓拜去世的時候指出包法利夫人在時代上獲得的千載難逢的際遇：

『在法蘭西小說史裏，包法利夫人是一個日期。牠點出某些東西結束和某些東西開始。讓我們拾起這個觀念，依照我們的力量和我們的方式來說，福樓拜的小說在他所有的其他價值之外，趕在他的時代出現先是一個價值。這是一個價值，十分現實，比我們所想得到的還要希有，正如另一個是能夠持久，還有另一個是能夠在牠的時間終結。我們需要加以解釋。在牠的時代出現，有時候，太常有了，像一個聰明人，利用一下一時浮囂的意見，一陣時髦的奇想，一陣世俗的悠忽的熱忱，如此而已。……但是出現在牠的時代，有時候，也就是本能地認清牠的時代的藝術，來到什麼地方，什麼是牠的正當的要求，牠對於新奇能夠承受些什麼：這，這不僅不是追逐時髦，而且常常是違反時髦，這不僅不是順流而下，正相反，是抵抗，是逆流而上。』

那麼，假如福樓拜的第一部應世製作，博得閨堂大彩的包法利夫人，如響斯應，投進時

代的懷抱，成爲時代的寵兒，什麼是這時代的面貌？什麼是布氏所指，在這裏結束，又是什麼在這裏開始？而且，什麼是包法利夫人，是順流而下，還是逆流而上，還是如聖佩甫所點定，新的文學的符誌是牠的特徵，也正是時代的特徵？

人人知道，從十八世紀中葉起，浪漫主義的情緒和感覺如同瘟疫，在歐洲蔓延開了，有時候化氣爲雲，狂風暴雨一般馳過天空，有時候小鳥啼春，寂寞的哀唱分外令人留連，高亢的吶喊和無病的呻吟同時響澈九霄。新的感觸給作家帶來新的世界。他們年輕，熱情，有勇氣，也有才分，而對面的是世俗，拘束，形式，典雅和傳統。他們的第一個敵人是正統，那羣食古不化的平庸的古典作家。雙方選定了法蘭西劇院做戰場，臺上是雨果的歐納尼 *Hernani*，一邊是雨果和他的義務打手，戴着寬大的水手帽，穿着獨出心裁的衣裳，紅顏綠色，專爲喊好而來，另一邊是將朽未朽的學院作家，燕尾服，大禮帽，以紳士的氣度，專爲喝倒采而來，一連繼續了幾夜，扔蘋果，丟紙團，歐納尼在喧呶之中站穩了，真正的觀衆站到這羣熱狂的青年一邊，學院作家的陣容凌亂了，潰敗了，於是就在一八三〇年的初春，浪漫主義的大纛高高飄揚在巴黎的上空。他們打開想像的檻車，『妓女幫外交官出主意，陰謀奪到有錢的小姐，囚犯的天才出衆，命運向高強認輸，』同時也撕爛生活的條款，赤裸裸把自己放在文字

當中，請人世連美帶醜一同觀賞。高地耶 Garter，衝鋒陷陣的將官，爲他們的放蕩不羈歌頌道：

『人知道我的名姓，我的日子過得歡喜輕快。』

這風靡了全法蘭西，這酩酊了大小城鄉的智識初開的年輕人，福樓拜便是其中的一個，他在布耶的遺詩序裏回憶學生時代道：

『我不清楚中學生的夢想是什麼，然而我們誇張到了萬分——浪漫主義最後一直開擴到了我們這裏，不爲外省環境所容，却在我們的頭腦形成奇異的沸騰。熱狂的心靈希冀戲劇性的愛情，有游艇，黑面具，和暈在喀拉布爾山林之間驛車裏的貴夫人，同時有些比較嚴肅的性格（愛上了阿爾芝·喀耐勒，一位同鄉，）企望報章或者講壇的喧囂，叛逆的光榮。一個修辭科學生，寫了一篇洛布斯比耶的辯狀，流傳到校外，引起一位正人君子的憤慨，結局是交換函札，提議決鬥，這個角色正人君子扮的並不

漂亮。我記得一個好小夥子，永遠戴着一頂紅小帽；另一個好小夥子，許願以後要像墨西哥人過活。我的一個知己打算出教，好去幫忙阿布德·艾勒·喀代爾。然而大家不僅是土巴都爾，反抗的，東方的，尤其是藝術家的；被罰的額外功課做完，文學就開始了；有人瞎破了眼睛，在寢室讀小說；有人在口袋帶着一把刺刀，猶如安東尼；有人還厲害厭惡生存，巴爾……一槍打碎腦髓，昂德……用他的領巾上吊；當然了，我們不配譽揚！然而多憎恨一切平庸！多心往偉大！多尊敬大師！大家怎樣讚賞維克道·雨果！在這一小羣激昂者之中，布耶是詩人，悲哀的詩人，廢墟和月光的歌者。」

然而寬廣不就是長久，經過十年的考驗，風氣漸漸在情感之中凝定，在思維上起了反應，而往日以『少年法蘭西』自命的一羣浪漫主義的運動先鋒，年事日長，社會地位日趨穩定，雖然沒有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也都好像從夢裏清醒了，明白小我之外還有世界，熱情之外還有文學。高地耶大談其至上的『為藝術而藝術』的議論，桑·喬治放下化名的人物，到田園尋找人類的同情，隨後她為浪漫主義辯護，也不得不承認牠『留下牠的過失』就是曾經沉醉於浪漫主義的福樓拜，終其生愛戴天才洋溢的雨果，一時批評

拉馬丁的小說：

『這需要拉馬丁所沒有的一種人格的獨立，人生的醫學的眼光，總之，這是唯一抵於清潔偉大的效果的方法。』

一時貶斥另一位詩人繆塞的『要唱歌只要受苦就夠了』的唯情論調。十年不是一個短時間，潮退了，大家開始思維。

在野的浪漫主義進了廟堂，另外一羣年輕人，還要窮，還需要掙扎，從鄉野趕到巴黎，希望抓住一個機會表白他們的切身的感受，以他們的憂患換取文藝女神的青睞。他們看到的是醜陋，他們沒有理由爲人生粉飾；美麗和想像不在他們的信心以內。生活的坎坷，經驗的淒涼，奮鬥的艱辛，才分的缺少，把他們逼到一條反叛的道路，雨果和他的人馬只是『文學的小丑』，通俗的山歌作者白郎翟 *Béranger* 應當受他們歡迎了，也只會被他們看做一名新聞記者，那和他們一樣窮，一樣被丟在正人君子的大門外的鮑德萊耳，又因爲取材偏於醜惡，不爲他們看重，巴爾扎克似乎應當是他們的師法了，然而也讓他們說做『他沒有



時間正確地看正確地描寫』可憐是他們自己又一直寫不出像樣兒的東西。他們的名姓早已和他們的作品進了樓閣，然而至少，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留下了一個不朽的名詞，涵義即或大有更改，成爲永遠成爲文學的輝煌的主流：現實主義。

現實主義在最初露面的時候正如浪漫主義，或者正如後來的自然主義，只是應戰方便的一個口號。沒有文學作品引人注目，一羣年輕人圍着古爾拜 Courbet 的油畫搖旗吶喊。批評家在這裏看見奇形怪狀的鄉下佬，大驚小怪，想不出更壞的名詞來詛咒，便拾起『現實主義』這塊爛泥投了過去。

『想做一個現實主義者，真實還算不了一回事：

要緊的是醜……』

於是這羣不見經傳的年輕人便賭氣拾起這塊拋來的爛泥，做爲他們敵對的旌旗。一八五六年七月，現實主義以一個雜誌的名義出現，或斷或續，出了六期，就和世人永訣了。同年十月，包法利夫人在巴黎雜誌按期刊載。這是一個無名作家的處女作，不在他們的羣裏，

也不在任何人的隊伍。官方把作者告到法庭，說他的小說敗壞道德宗教，歸入『現實主義文學』之林。儘管現實主義的主編杜朗地 *Duranty* 把所有的毛病給了包法利夫人，認爲一無可取，『用不着追尋作品本身的觀點』，然而讀者驚於牠的新穎，一時沒有更相宜的標記來說明牠的特徵，由於懶惰，由於方便，也由於一部分的道理，便拿杜朗地之流的『現實主義』招牌，借花獻佛，轉贈包法利夫人的作者桑·喬治曾經排斥這種看法：

『自從這本名作出現以來，在我們小小的角隅，我相信，猶如在各地，有人叫喊：——這是現實主義派一個十分驚人，十分雄壯的範本。那麼，現實主義者存在了，因爲這本書十分新穎。

但是仔細一想，我們就發見，這仍然屬於巴爾扎克（對於作者確然只有更好，）除盡了傳奇的喜好的巴爾扎克，尖刻愁苦的巴爾扎克，集中的巴爾扎克，假如可以這樣說的話。●

甚至於任憑福氏向朋友們抗議：

『人家以爲我愛上了現實，其實我厭惡牠；因爲我從事於這部小說，由於憎恨現實主義。可是我也不因而就少所厭憎於虛僞的理想觀念，流動的時代拿這個也就奚落夠了我們。』

沒有用。一般文學史把包法利夫人看做現實主義的傑作。原因是太簡單了，在這紛紜然而空白的時代，沒有一部作品像包法利夫人那樣能夠說明牠的時代的進展的方向和特徵，如聖佩甫所列舉：『科學，觀察的精神，成熟力，一點點嚴酷。』時代在等着牠的真宰。巴爾扎克在一八五〇年去世，小說的寶座空了六年，於是福樓拜無所企求，原來默默無聞，一下子甚囂塵上，成了時代的寵兒。

十九世紀是一個普遍的覺醒的時代。人類在過去曾經三番四次覺醒，然而不相呼應，間歇而又隔絕，直到十八世紀末葉，法蘭西大革命爆發，加快血液的循環，加強知識的傳播，一切重新估價，重新加以認識。人在寂寞之中，首先看到自己，於是浪漫主義席卷文學，隨手拋置過剩的情感，然而同時正有許多東西，在文學之外，在人心之中躍然前進，學問不是少

數人的了，工具和知識通俗了，也提高了，文學是繁複的社會的反映，不可能孤立，所以就在呻吟呼號『處處聞』的時候，有心人不得不撥開情感的雲霧，加深考慮文學創作和人生其他活動的密切聯繫。假如貧苦增強戰鬥的意志，社會主義美化了理想，科學的宣示同時也搖動了許多執迷不悟的心靈。這不是古今之爭的優劣問題，而是創作上認識和表現問題。文學不和戰爭一樣，建設永遠要比摧毀重要。不破壞，然而以作品本身的時代的意義，往前推進。在文學上，沒有一個東西能夠可以說做代替另一個東西的，因為時代和個性是文學的雙重基石，有價值（相對而又絕對）便存在，不存在一定是沒有價值。福樓拜不可能代替巴爾扎克，但是由於性情不同，尤其重要是，由於體驗不同，福氏儘可以從他不同的環境發掘一些達到真理的不同方法。他可以否認杜朗地之流的粗俗的現實主義，然而他由時代所領會的種種關於文學的理論，讓他活在他的時代，同時他的生命含有新的種子，連同『未來』也跟着他活在他的時代。於是『未來』酬謝他，把他帶過他的時代。

就在從事於包法利夫人的期間，福氏認為：

『越往前進，藝術越要科學化，同時科學也要藝術化。二者從底基分手，回頭又在

在另一個地方，他推論科學方法的重要：

『一個人弄批評，必須和弄自然歷史一樣，不帶道德的觀念。問題不在痛斥何種形式，而在表明牠含有什麼，牠怎麼樣和另一種形式結合，她仗什麼活着（美學等待牠的焦夫瓦·聖·伊萊耳，這位大人物曾經指出妖怪合法。）當我們費若干時日處理人類的靈魂，如同物理學研究物質，大公無私，我們可以大為進步。人類把自己稍稍放在自己之上，這是唯一方法。然後對着作品的鏡子，人類可以坦白地，純潔地端相自己。人類將如上帝，從高處裁判自己。好啦，我相信這行得通的。這或許只是一種方法的尋求，如同數學。這特別可以應用到藝術與宗教方面，觀念的兩大表徵。假定這樣開始：最先的上帝的觀念有了（最薄弱的），最先的詩的情緒生了（最輕微的），先追尋牠的表徵，很容易就在小孩子，野人等等身上找到了。這是第一點。這裏，你已經可以建立關聯了。隨後，繼續下去，把一切相對的偶然現象算進賬去，如同氣候，語言等等。於是，

一步又一步，我們就這樣一直到了未來的藝術，『美』的假設，牠的現實存在的明白理解，最後，那理想的典型。（我們的力量全朝這裏匯聚。）然而擔當這個苦工的不是我，我有別的筆尖要修。」<sup>④</sup>

他在包法利夫人之前曾經試過不少製作，曾經把他的心全部浸潤過去，然而他自己說的好：『人用腦子寫文章，不用心寫文章，』他把牠們放在一邊，從事於一種新的嘗試，根據一個修正的觀點，完成他對自己同時也就是對時代的一種非常的考驗，因為在摸索和體驗之中，他逐漸爲自己找到一個恰當的表現方法。

包法利夫人對於牠的作者原來只是一種考驗：

『對於我，包法利夫人是一個定局，一首命題。我所愛的全不在這裏。』

他所愛的在浪漫主義化育的想像的自由天地，在他念念不忘的聖安東的誘惑初稿

裏，然而杜剛和布耶兩位最好的朋友，異口同聲，勸他放下這蕪亂的製作：『你想弄音樂，弄出來的只是嘈雜的音響。』福氏據說搖動了，向他們請教補救的方略。他們這樣回答道：

『你必須放棄那些冗長的主旨，牠們本身模糊，你就不可能加以集中：你既然克制不了你抒情的傾向，必須挑選一個主旨，抒情在這裏萬分可笑，你不得不加意小心，棄絕這種傾向。挑選一個實際的主旨，一個中產階級生活所富有的事故，例如巴爾扎克的白特 *Cousine Bette*，或者彭 *Cousin Pons*，壓迫自己用一種自然的情調，差不多親切的情調，來處理牠，去掉那些題外的枝節，本身美麗，然而就你的概念的發展來看，祇是無用的小菜，對於讀者也只是膩煩而已。』

但是，寫什麼呢？假如寫的話。他們坐在花園，想為苦悶的福氏打出一條活路，忽然布耶破口道：

『——你為什麼不寫德樓迺 *Delannay* 的故事？』

福氏仰起頭來，歡歡喜喜喊道：

杜剛在他的回憶錄裏記錯了德樓迺的姓氏，根據後人實地調查和研究的結果，那可憐的鄉下醫生的本來名姓是歐皆·德拉馬爾 Eugene Delamare，是福氏父親主持的市立醫院的一個實習生，畢業以後，在叫做芮 Pa的一個小鎮開業行醫。小說裏的查理·包法利，忠厚，愿實，無知，無學，心性和遭遇全同他相似。就是永鎮的風景，房屋的排比，鄰舍的遠近，也都和芮大同小異。德拉馬爾能夠娶到一位闊小姐，戴耳芬·古杜芮耶 Delphine Couturier，和小說裏相仿，不是由於本人具有任何優越條件，而是比福氏所提供的還要有趣：古杜芮耶地主，不肯宣洩他的財產的實況，每逢有人向他的女兒求婚，總是在這一點灰了對方的心。最後，來了我們的窮醫生，戴耳芬將近二十三歲，傳說不要再等下去，她便用手帕做了一個假肚子，引起家人的焦灼，急不擇食，匆忙把她嫁給這忠厚的年輕人。她生了一個女兒。她在近隣結識了一個情人，一個叫做路易·康皮雍 Louis Campion 的荒唐鬼，破了產，跑到美洲，空着兩隻手回來，在巴黎的街道拿手槍打死自己。小說的進展幾乎全部根據事實：生活糜爛，債臺高築，她另外交結了一個情人，一個小書記，最後活不下去，服毒自盡。德拉馬爾爲她立了一方『賢妻良母』的墓碑，不堪傷心，不久也就隨她下世了。



這樣一個凡庸的主旨，這樣一個報上常見的故事，對於中產生活並無好感的福氏，當然成爲他所謂的『一首命題』。他必須從他四周的中產階級選取他的全部人物，然而中產階級，到了十九世紀，又是什麼樣的中產階級？『我看不見他們讀別的報章，用不同的音樂自娛，具有更高的喜悅。這個人，或者那個人，都同樣愛錢，同樣尊敬既成的事實，同樣爲了破壞需要偶像，同樣憎恨一切優越，同樣譏笑的精神，同樣無底的愚騷』法郎士 France 以爲『他最敬重吉訶德先生，他自己正和他一樣。』但是當吉訶德先生走一個極端的時候，福氏，一個現代的吉訶德先生，走的是兩個極端，或者全靈，或者全肉，但是唯有折衷，中產者的生存之道，才最違反他的浪漫主義的追求：

『我愛人間兩種東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希有的愛情。這就是爲什麼我歡喜隱居生涯，我也歡喜玩世不恭。然而我憎恨取悅婦人的精神。真的，沒有牠，人也活的了！這種譬與心的永久的揉混，唯有令人作嘔。』

愛瑪·包法利追逐理想的失敗，如若尋找一個註解，如若想從福氏的觀點尋找一個